

资本流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长三角 16 个中心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赵冉冉¹ 沈春苗²¹

(1. 南京大学, 南京 210000; 2. 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 210000)

【摘要】: 当下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时期, 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经济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三次产业的加权平均数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测度指标, 采用 2005–2016 年间长三角 16 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 从配置效应、集聚效应和交互效应三种理论机制出发, 分别考察分析了资本流动、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 资本流动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其中财政资本流动、境外资本流动、社会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银行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明显; 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尤为明显。另外, 进一步分析表明资本流动和产业集聚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交互效应, 但影响并不显著。由此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一方面在于有效促进资本流动, 通过资本流动与转移改变要素资源配置结构; 另一方面在于加强产业集群建设。

【关键词】: 资本流动 产业集聚 产业结构升级 交互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公共预算收入、货物进出口总额分别实现了 9.5%、8.5%、13.8%、14.5% 的年均增长率。过去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产业结构转型等重大举措带来的总量扩张。然而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发展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哪些重要因素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 诸多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经济热点。

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 早期主要集中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构建与测算、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近年来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分析。其中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及动力机制研究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要素流动角度出发, 研究了资本要素流动、人力资本要素流动、直接利用外资、社会融资结构等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第二类是从技术创新角度出发, 研究了研发投入、信息化发展、价值链攀升、产业集聚等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 第三类是从制度与政策角度出发, 研究了政府干预、制度环境、货币政策等因素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机制。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 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受到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 并且每种因素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

作者简介: 赵冉冉(1985–), 女, 山东济宁人, 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 沈春苗(1986–), 女, 安徽六安人,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学。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研究”(19YJC790109), 主持人: 沈春苗;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江苏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防范与化解逆库兹涅茨化对策研究”(18EYC001), 主持人: 沈春苗;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智能制造背景下江苏省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研究(2018SJA0222)”, 主持人: 沈春苗。

制和影响路径又各有不同。

从要素流动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层面,金柯宇(KEYUJIN, 2012)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表明国际资本倾向于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更专业化的国家或地区,这称之为“配置效应”;同时还出现了“集聚效应”,它导致国际资本流向有效资本劳动率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最终资本流动的方向取决于这两种效应较大的一方。^[1]赵文军、于津平(2012)利用30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总体和行业两个层面分析了进出口和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进口比出口对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FDI的增加会带动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并且进口、出口和FDI分别对资源密集型工业行业、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行业、平均规模较大的工业行业以及平均规模较小的工业行业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别。^[2]杨飞虎等(2016)研究了政府投资、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关系,结论发现社会性公共投资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显著,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著;生产性公共投资与人力资本提升均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促进作用。^[3]

从技术创新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层面,王春晖,赵伟(2014)从集聚外部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产业集聚对于地区经济绩效、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结论表明在区域开放条件下,区域内厂商通过产业集聚获得集聚外部性利益,从而可以提升地区经济绩效。并且集聚外部性视野下的产业集聚又可以引发“技术进步”“细分产业链”“优化制度结构”三个层面的产业升级。^[4]陶长琪等(2017)首先测度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强度,然后基于SDM模型分析了经济集聚水平与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论得出技术创新强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两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效应,并且经济集聚可以显著地强化技术创新强度对于产业结构“两化”发展的影响。^[5]

从制度和政策引发的产业结构升级层面,彭俞超等(2016)使用修正后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深入分析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稳定的影响,文章发现再贷款利率、再贷款比例、存款准备金率和准备金存款利率四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均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稳定;并且非对称结构性货币政策能够更有效地兼顾经济稳定目标和产业结构升级目标。^[6]钟军委,万道侠(2018)以资本流动为中介目标,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和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本空间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提升了区域间资本配置效率,这与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和公共财政资源的空间错配有关;资本流动有益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且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资本空间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协同影响效应。^[7]

上述研究对于我们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以及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并且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都有较多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从理论层面来看,现有研究较多偏重于单项因素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实证层面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将资本流动、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研究前两者对后者的影响以及交互效应;第二,本文选择具有产业集聚特色的长三角地区16个中心城市作为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从理论出发说明资本流动、产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第三节是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说明;第四节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节进一步讨论资本流动、产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效应;第六节是本文结论与相关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资本流动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基于配置效应分析

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中,资本的本质在于它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资本之所以能够实现增值(包括价值增值和资本增值),关键在于它处在无休止的运动中,不断地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之间进行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使得资本在“追求高利润率”的驱动下在各部门之间流动,从而改变各部门之间的比重。资本流动引起部门比例变化的过程可以具体描述为: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进一步带动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使得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倾向于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直到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平均化”,从而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因此,资本流动通过带动其他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实现各部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假设 1:资本流动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二)产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基于集聚效应分析

根据王春晖(2014)的研究,产业集聚可以分为平行产业集聚和垂直产业集聚,即相同产业集聚和不同产业基于产业链的协同集聚^[4]。以马歇尔(Marshall, 1920)、阿罗(Arrow, 1962)、罗默(Romer, 1986)为代表的 MAR 外部性理论,认为相同产业集中布局可以实现运输成本下降、知识技术溢出和专业化加强等集聚外部性等,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8-10]以雅各布(Jacobs, 1969)为代表的 Jacobs 外部性理论,认为不同产业的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协作、分工细化、产业链延伸等垂直关联实现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11]。因此,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外部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假设 2:产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

(三)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作用:基于交互效应分析

基于配置效应分析,资本流动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当资本对某一部门或某一地区的净流入大量增加时,自然会带动某一部门或某一地区的产业资本和生产要素集中,从而形成产业集聚和生产扩大,这是产业集聚实现的重要机制。根据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产业集聚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成本下降、规模经济、知识溢出、分工专业化等优势;基于集聚效应分析,反过来产业集聚也可以促进上述优势进一步实现,上述优势的实现必然会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相应流入。因此,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互动作用。

假设 3: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交互作用。

三、模型设定、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除了资本流动、产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以外,消费水平、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也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周叔莲, 2001; 文启湘, 2005; 昌忠泽, 2018)。^[12-14]在实证中本文设定如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Y_{i,t} = \alpha + \sum_j \beta_j * Capflow_{i,t-1} + \gamma * aggro_{i,t} + \sum_j \theta_j * Control_{i,t} + \mu_i + \ta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不同的城市和年份, j 代表向量包含的同类变量个数。 $Y_{i,t}$ 代表产业结构升级指标, $Capf_{i,t-1}$ 为资本流动向量(资本流动通过导向机制,改变要素资源配置结构,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这个过程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agglo_{i,t}$ 是产业集聚指标, $Control_{i,t}$ 代表控制变量向量, μ_i 和 τ_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特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β_j 、 γ 、 θ_j 分别代表资本流动、产业集聚、控制变量的系数。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Y)

早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都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做了研究和探讨,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描述为: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第一产业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所以本文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测度,采用徐德云(2008)的研究方法,对一二三产业分别赋值 1、2、3,然后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 Y。^[15]

$$Y = \sum_i^3 y_i * i = y_1 * 1 + y_2 * 2 + y_3 * 3 (1 \leq Y \leq 3)$$

其中, y_i 为第 i 产业的产值比重, Y 为产业结构升级系数。 Y 值越接近于 1, 则产业结构层次越低; Y 值越接近于 3, 说明产业结构层次越高。

2. 解释变量

(1) 资本流动 (Capflow)。参与资本流动的经济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社会公众四大经济主体, 它们所涉及的资本流动分别体现为财政资本、银行资本、境外资本、证券资本、其它社会资本的流动。由于证券市场筹资额在我国社会总融资中的比例较小且不稳定, 因此证券资本流动在本文中不予考核。因此资本流动向量如下: (1) 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fisc) 衡量财政资本流动; (2) 以银行存贷款增量差 (disp_loan) 衡量银行资本流动 (银行资本在产业间进行资源配置主要通过贷款业务, 所以银行存贷款增量差与产业结构升级呈负相关关系); (3) 以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inv_n) 衡量社会资本流动; (4) 以实际利用外资 (cap_f) 衡量境外资本流动。

(2) 产业集聚 aggllo。因为我国产业结构是不断趋向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 所以本文采用二三产业区位熵来衡量产业集聚程度, 从产值和就业人数两个角度分别测算了二三产业综合区位熵。

3. 控制变量

除了上述解释变量以外, 产业结构升级还受到消费水平、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文献成果选择如下控制变量 Control: (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应消费水平 (cons); (2) 用专利授权项数衡量创新能力 (inn); (3) 用邮电业务总收入衡量信息化水平 (inf)。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 2005-2016 年中国长江三角洲 16 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 (暂时不包括安徽省城市数据), 其中 16 个中心城市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常州、镇江、南通、绍兴、扬州、泰州、嘉兴、湖州、舟山和台州。所有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以及 2005-2017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 部分数据来源于《长三角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单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产业结构升级系数 (Y)	无	192	2.38	0.09	2.20	2.69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fisc)	亿元	192	49.09	106.79	-138.99	672.06
银行存贷款增量差 (disp_loan)	亿元	192	399.23	1842.60	-1717.70	24406.80

新增固定资产 (inv_n)	亿元	192	1417.39	1115.91	78.65	4701.08
实际利用外资 (cap_f)	亿美元	192	28.90	33.69	0.31	185.14
产业集聚程度 (agglo)	无	192	1.05	0.03	0.97	1.12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cons)	亿元	192	1710.52	1796.99	100	10947
专利授权项 (inn)	万项	192	1.65	1.79	0.01	9.84
邮电业务总收入 (inf)	亿元	192	113.69	148.75	8.93	1016.44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检验结果分析

基于前面的理论模型, 本文通过三个模型将资本流动、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逐步回归, 用以检验前文的假设。对三个模型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对比分析, 结果都很好地揭示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方向和相关程度, 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吻合。为了判定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 分别对模型(1)、模型(2)和模型(3)进行 Hausman 检验, 检验结果发现, 除模型(1)以外其他两个模型的 P 值都在 5% 以内, 显示拒绝原假设, 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关于假设 1 的验证, 从上述逐步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均与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 银行存贷款增量差与产业结构升级负相关, 与假设 1 的理论预期完全吻合。并且在模型(1)和模型(2)中, 除银行存贷款增量差变量以外, 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均高度显著。这表明财政资本、银行资本、境外资本、社会资本流入市场后, 通过导向机制改变要素资源配置结构, 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模型(3)显示, 加入控制变量并不改变资本流动变量的系数符号, 仍然符合资本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结论, 不过境外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被弱化, 表现为系数不显著。通过方差膨胀因子 VIF 检验, 发现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VIF 值最大, 达到 10.63), 另外也可能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市场组织形态有关系(张伯超, 2018)。^[16]

关于假设 2 的验证, 模型(2)和模型(3)的估计结果都显示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完全符合假设 2 的理论预期。这说明促进产业集聚, 基于合适的竞争合作关系形成产业集聚区, 或者基于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形成一体化产业园区, 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效应, 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

控制变量方面,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 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 专利授权项数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新技术对产业内的传统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进行革新, 也可以通过产业间的技术关联实现技术外溢, 从而促进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提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 邮电业务总收入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说明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产业结构升级, 但是因为信息化水平提高对所有产业发展都产生促进影响, 所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资本流动、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稳健性, 采用劳动力结构指数(即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人口在总劳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代替产业结构升级进行稳健性检验。另外, 当采用第三产业劳动就业人口比重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时, 第二产业集聚度与第三产业集聚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相反, 从而导致影响关系模糊化, 因此稳健性检验中采用第三产业就业区位熵来替代二三产业综合区位熵。

通过 Hausman 检验, 模型(1)、(2)、(3)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 所有解释变量系数符号与上文研究结论

相吻合,而且三个模型的 R^2 均高于 80%,从而进一步验证了资本流动和产业集聚确实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在未加入控制变量之前,除银行存贷款增量差($disp_loan$)以外,其它各解释变量均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加入控制变量以后,财政资本流动、银行资本流动、其它社会资本流动及产业集聚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显著,境外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在模型(3)中的控制变量中,信息化水平(inf)的系数符号为负,主要是因为邮电业务总收入本身包含在第三产业中,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所以导致控制变量中的信息化水平影响异常,因此稳健性检验可以选择模型(2)。

五、进一步讨论:资本流动、产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效应

一些学者认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国跨国企业的战略和产业集群的发展是相互依存的。格拉布(Grabner, 1993)认为跨国公司的关键技术、增值部分主要集中在母公司,而非进入产业集聚区域的境外子公司,因此境外子公司往往因技术含量较低、产业关联较弱而难以对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乃至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17]与此相反,杜宁(Dunning, 1998)则列出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的典型贡献:就业、培训、技术转让、需求预期的创造、企业家精神的激励以及其它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区域集群发展以及地区产业升级。^[18]恩莱特(Enright, 2000)认为区域集群(产业集群)与外国跨国企业的战略可以产生协同效应,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投资和选址决策中使用集群逻辑,即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投资时,会考虑东道国区域集群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企业间合作等优势。例如,德国和瑞士的机械公司在美国开发软件;欧洲制药公司投资于加利福尼亚和新英格兰的生物技术集群;美国电子公司投资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制造业集群。^[19]上述两类观点认为产业集群与跨国企业的发展存在“相互依赖模式”。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资本流动中的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交互效应?随着产业集聚的不断加强,境外资本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是否进一步加强?因此,模型中进一步融入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的交叉项,进而探讨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alpha + \sum_j \beta_j * Capflow_{i,t-1} + \gamma * aggro_{i,t} + \delta * cap_f_{i,t-1} * aggro_{i,t} + \sum_j \theta_j * Control_{i,t} + \mu_i + \tau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公式(2)在公式(1)的基础上引入了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的交叉项,根据交叉项的系数估计值探讨境外资本流动和产业集聚的互动效应。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公式(1)相同, $Capflow$ 和 $Control$ 分别代表资本流动向量和控制变量向量, $agglo$ 代表产业集聚变量。根据 Hausman 检验,模型(1)和(2)的所有检验结果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为了节省空间,不显示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关于假设 3 的验证,模型(1)和模型(2)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前后的对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中各解释变量和交叉项的系数符号均符合预期,除银行资本流动以外,财政资本流动、境外资本流动、社会资本流动和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仍然显著,均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境外资本流动和产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交互效应,共同加强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模型(2)结果显示,加入控制变量后除境外资本流动变量系数外,其它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不变,仍然符合上述结论:境外资本流动和产业集聚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交互效应,即假设 3 成立。但交互效应不显著说明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不稳定,从而难以显著地强化产业结构升级。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符合生命周期理论,伯金肖(Birkinshaw, 1998)认为:FDI 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符合生命周期理论,FDI 对成熟产业集聚的影响是正面的;而在高速增长的产业集聚区,由于跨国公司子公司根植性较低,产业关联较少,产业链长度较短,因此 FDI 与产业集聚的相互影响比较有限。^[20]进而说明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对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效应相对较弱。

另外,加入交互项后,境外资本流动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没有通过 10%的显著性,系数符号也不稳定。这说明,虽然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对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交互效应,但是随着产业集聚的不断加强,境外资本流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并没有进一步加强。这与交互项不显著的理由一致。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长三角地区作为全国经济最活跃和产业集聚特征最明显的地区之一,过去在经济总量、投资消费、产业创新等方面都对全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贡献,未来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承担着“实现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使命。因此本文选取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有着微观而重大的意义。本文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进而利用长三角地区 16 个中心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其中财政资本流动、社会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银行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始终不明显,境外资本流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稳定,介于前两者之间。(2)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境外资本流动与产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正向交互效应,但交互效应不明显。这也部分肯定了一些学者关于“外资进入与产业集聚之间的依存关系可以带动地区产业升级”的研究结论。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一方面在于有效促进资本流动,通过资本流动与转移改变要素资源配置结构,另一方面在于加强产业集群建设。具体来说:(1)政府部门可以合理地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大资金支持,如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其它附加值较高的新兴战略产业等;(2)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源动力,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决定了产业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布局,因此要努力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投资资本,并着力引导投资资本的合理配置,达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3)加大开放力度,充分引进外资。完善外资准入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结合相关鼓励政策引导外商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投资领域,特别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 年修订)》中提到的相关领域,除引资以外,还应促进引技引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4)通过政府干预和市场自发力量,使区域内形成竞争与合作并存、产业关联度较高的产业集聚区。

参考文献:

- [1]KEYU JI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flow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Vol. 5, 2111-2146.
- [2]赵文军, 于津平. 贸易开放、FDI 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基于 30 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2 (8): 18-31.
- [3]杨飞虎等. 政府投资、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面板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讨. 2016 (12): 18-25.
- [4]王春晖, 赵伟. 集聚外部性与地区产业升级: 一个区域开放视角的理论模型[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4): 67-77.
- [5]陶长琪, 彭永樟, 经济集聚下技术创新强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 (3): 91-103.
- [6]彭俞超, 方意, 结构性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稳定[J]. 经济研究, 2016 (7): 29-42.
- [7]钟军委, 万道侠. 地方政府竞争、资本流动及其空间配置效率[J]. 经济经纬. 2018 (7): 141-149.
- [8]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New York: Mac Millan, 1920.
- [9]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J]. The Reviews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Vol. 29, 155-173.

-
- [10]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986, Vol. 94, 1002-1038.
- [11]Jacobs J. The Economy of Cities[M]. New York: Vintage, 1969.
- [12]周叔莲, 王伟光.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 管理世界, 2001 (5) :70-79.
- [13]文启湘, 冉净斐. 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和谐: 和谐性及其测度[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8) :14-19.
- [14]昌忠泽, 孟倩. 信息技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8 (6) :39-49.
- [15]徐德云. 产业结构升级形态决定、测度的一个理论解释及验证[J]. 财政研究, 2008 (1) :46-49.
- [16]张伯超等. 行业资本收益率、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J]. 财经问题研究, 2018 (8) :34-41.
- [17]Grabner G. The Embedded Firm and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18]Dunning J. H. Loca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Neglected facto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 Vol. 29, 45-66.
- [19]Michael J. E. Regional clusters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2000. Vol. 30, 114-138
- [20]Birkinshaw, Julian M. , and Neil Hood. Roles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in Industry Clusters[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1998.